

当代农村人口跨境迁移特征的微观解读

——对于福建沿海J村新移民潮的实证考察

孟庆梓

(厦门大学 人文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 本文运用实地调查资料, 以改革开放后J村出国移民潮为考察对象, 从微观角度对当代农村人口跨境迁移特征进行解读, 指出当代农村人口跨境迁移过程中已经形成了全球化态势、波浪型演进、双向流动与多重流动, 以及“换代迁移”的基本特征, 这些特征反映了国际国内的时代背景, 并且仍将在此背景下继续演进。

关键词: 农村; 人口; 跨境迁移; 新移民

中图分类号: C9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4149 (2007) 02—0066—06

A Study of the Features of Contemporary Countryside Population Transnational Migration: A case study of the New Transnational Migration Wave of J Village in Fujian Province

MENG Qing-zi

(School of Art and Humanities,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Province, China, 361005)

Abstract: This is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the author's field research. With data of transnational migration wave of J village since the Economic Reform,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features that have shaped in the course of transnational migration of the contemporary countryside population in China.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 features of global trend, advancing wave upon wave, two directions' move and many times move, "migration between two generations" have been shaped in the course of contemporary countryside population transnational migration. These features reflect the internal and international Times backgrounds, and will advance continually under these backgrounds.

Keywords: Countryside; Population; Transnational migration; New migrants

一、问题的缘起

“新移民”是改革开放后兴起的一个新概念, 其一般含义系指“改革开放以后移居国外的我国公民”^[1]。随着中国当代跨境移民浪潮

的逐渐兴起, 近年来, 有关中国大陆新移民问题的探讨逐渐成为国际移民研究领域的一个学术热点问题。社会学、人口学、经济学、历史学、地理学等多学科研究方法的介入也使得该

收稿日期: 2006—11—29

作者简介: 孟庆梓 (1975—), 男, 河北邢台人,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华侨史、华人社会文化。

问题的探讨逐步走向深入。

就现有研究成果而论,针对新移民问题的讨论基本集中于两个主体的对象范畴——精英移民群体和非精英移民群体^①。其中,围绕非精英移民群体展开的农村人口跨境迁移问题研究已经取得了较大进展,相继出现了以新移民潮最为活跃的浙江、福建、广东等东南沿海侨乡地区新移民为研究对象的一系列文章,针对当代农村人口跨境迁移的动因,移民网络及其运作,移民在迁入地的生活状况,以及非法移民等问题展开了广泛探讨。

这些现有学术成果为农村人口跨境迁移问题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创造了良好的基础环境。然而,就目前研究该问题的切入点来看,把农村人口跨境迁移现象视为一个动态有机过程进行整体考察的文章尚不多见。并且,从研究内容的主题来看,对于当代中国农村人口跨境迁移特征的专门论述亦属“短缺”。有鉴于此,本文将从微观角度出发,以福建沿海J村新移民潮为实证考察个案,运用移民系统理论的方法,把迁移视为一个循环的、相互依存并能自我修正的动态系统^[3],就中国当代农村人口跨境迁移的基本特征作分析,试图从微观层面解读当代中国农村人口跨境迁移的基本形态。

二、材料来源解析

J村位于福建省中部沿海一带,这里既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侨乡,也是当代农村人口跨境迁移现象凸显的活跃区。据J村村委会统计材料显示,该村移居在海外的老一代华侨华人共有1万余人,主要集中于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等东南亚国家。另一方面,改革开放20多年以来,为了进一步拓展生存空间,实现求富的理想,先后有数百个J村人通过各种渠道前往国外谋生。村委会记录资料显示,截至2004年6月,该村在海外(包括港澳地区)的新移民群体中合法居留者共有552人,占了全村总人口数的15%强。按照村民的普遍反

映,村内每家至少有一人出国打工。就其周围环境而论,J村所在的镇辖区、市辖区,乃至整个福建省沿海一带均是中国当代农村人口跨境迁移活动频繁的典型地区。这种实况与浙江省温州市、丽水市(青田县),以及广东省江门市、梅州市等当代农村海外新移民迁出地聚集区有着颇为一致的人文地理环境。因此,J村新移民潮个案基本具备了当代农村人口跨境迁移中的共性,这便从客观上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典型而又切题的实际材料。

在资料收集方式上,分析材料主要源自本人于2003年、2004年以及2006年先后数次到J村进行的为期近两个月的实地调查所得,并查阅了相关文献资料。在调查中,笔者主要采用了社会人类学中的田野调查方法,走访了J村数十户出国人员家庭(涉及新移民人数在100人以上),对新移民家属和部分归国新移民进行深度访谈,获得了许多真实、深入的一手材料,同时也从当地村委会、镇侨联得到了不少相关文献资料。

三、当代农村人口跨境迁移特征的实证解读

(一) 空间流向的全球化态势

改革开放20多年以来,J村人跨境迁移的迁入地范围已经遍布于世界六大洲的20多个国家或地区,呈现出全球化的发展态势。用村民自己的话来说:“我们村里人去的地方(国家或地区)海多了”。

据笔者的大量访谈资料显示,J村新移民的迁入地主要分布于新加坡、香港、澳门、日本、韩国、阿联酋、伊拉克、以色列、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匈牙利、英国、法国、比利时、爱尔兰、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加拿大、阿根廷、洪都拉斯,以及毛里求斯等20多个国家或地区。其中,在国外获得合法居留权的552人中,按洲际分布计算,欧洲有138人,北美洲有38人,大洋洲有26人,南

^① 在这两个移民群体中,前者凭借资金、教育、科技等方面的优势移民他国,我们习惯上熟悉的投资移民、留学移民、技术移民均属此类,该群体往往来源于城市居民;后者则是在不具备这些优势的情况下而出国,劳工移民、家庭团聚型移民等多属此类,农村移民已成为该群体的主要来源。从法律意义上讲,非法移民往往存在于非精英移民群体中。

美洲有5人,非洲有3人,另有亚洲342人^①。

另一方面,从历时态的角度来看,J村人跨境迁移的全球化态势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

J村最早出现新移民起步于改革开放之初,1978年,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外交部、国务院侨办《关于放宽和改进归侨、侨眷出境审批的意见》,凡申请出国理由正当的归侨、侨眷,只要前往国家允许入境,一般都从宽掌握,给予方便。国家政策的放宽,迅速推动了东南沿海侨乡地区新移民潮的兴起。作为传统侨乡,J村人的跨境迁移活动就是在老一代移民亲属的直接帮带下兴起的。由于当时有的东南亚国家限制中国移民入境,所以J村最早出去的一些新移民大都凭借到东南亚的“探亲”证件而滞留于港、澳地区,并转为当地合法居民。因此,J村人跨境迁移的起始迁入地主要集中于港、澳两个固定点。

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期,J村人跨境迁移的空间范围进一步扩展到亚太区域。1985年11月,中国政府正式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出入境管理法》,进一步简化了出国手续,为中国公民出国提供了法律保障和制度保障,进而也推动了中国大陆向海外移民的新浪潮。该时期J村人跨境迁移的新流向地是新加坡、日本和澳大利亚。1988年村内曾经同时有3人因为留学而前往澳大利亚。1990年中国与新加坡建交之后,拥有众多同村乡亲的新加坡又很快成为J村人跨境迁移的新方向。另外,此间也有一些村民以各种非正常渠道迁至日本。

90年代至今,J村人跨境迁移的流向由亚太地区向世界范围迅速扩展。先是90年代初,有几个早期定居香港的乡亲去了洪都拉斯,进而又转入了欧洲国家。这个事件启动了J村人跨境迁移趋向全球化的进程。此后,随着国内外相关迁移政策的不断调整,特别是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J村人跨境移民的迁入地范围日渐扩展到以欧美发达国家为主流导

向的世界20多个国家和地区。

总体而言,当代J村人跨境迁移的历程在空间流向上经历了一个港澳——亚太地区——世界范围的逐步全球化过程。这种趋势顺应了全球化时代国际人口迁移的总体态势。正如国内一位学者所言,当代侨乡的移民潮“以进入发达国家劳动力市场为主要流向,其实是一种以民间方式运做的跨境劳务输出;从长远看,是中国自身极其丰富却又无法充分消化的人力资源伴随全球化进程而不可避免地融入世界大市场需求 of 的必然过程^[3]。”

(二) 历时态的波浪型演进

从纵向角度看,J村人跨境迁移的发展规模并非总是一帆风顺地表现为直线上升的发展形态,而是呈现出一种忽大忽小、波浪型前进的总特征。

以1996年至2003年作为观察时间段,我们可以从该时期J村迁出人口数量变化曲线图(见图)中看到,J村人跨境迁移明显地呈现出波浪型演进的总态势。其中,3个“波峰”分别出现于1996年、1998年、2000年,3个“波谷”分别出现在1997年、1999年和2002年,迁出量规模最大出现于1996年,规模最小出现在2002年。总体看,该时期J村人口迁出的平均量保持在43人/年的规模。

那么,为什么会呈现出这种波浪型演进的发展形态呢?

人口地理学家瓦·维·波克希舍夫斯曾把移民流的动态系统比喻为由电流、电位差与电阻组成的电路系统。并且指出,就像电流遇到不同阻力的介质而大小不同一样,移民流遇到不同的困难时也会表现出不同的规模状态^[4]。J村人跨境迁移规模发展过程中的波浪型演进形态,正是这种认识的实践反应。在调查中,笔者注意到,不少村内人的谈话反映到迁移者数量和迁入地选择跟当时的国内外政策形势有密切关系,特别是要因迁入国的移民政策形势而定。笔者在调查中常常听到村民们谈到前些年

^① 此处数据由J村村委会提供,统计时间截至2004年6月。

去哪个国家的人比较多, 因为那里“容易去”、“好定居”; 现在哪些国家不好去了, 因为那里“难过去”、“定居难”之类的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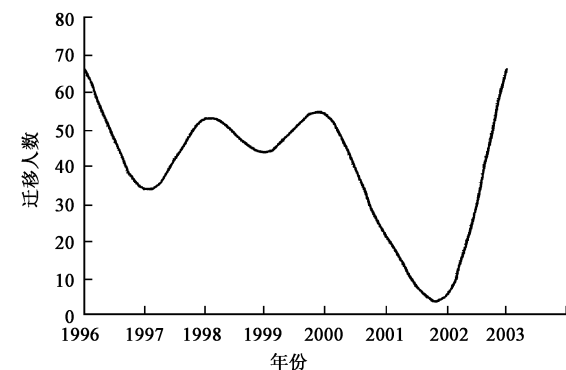


图 1996~2003 年 J 村迁出人口数量变化曲线图^①

由此可见, 对 J 村人跨境迁移发展规模的波浪型演进形态起到巨大调控作用的障碍性因素应是国内外政策形势“合力”作用的结果。一方面, 新移民的发展状况与各个时期国内公安部门的宏观调控措施直接有关, 出入境管理工作时紧时松、反复波动, 制约着新移民的发展规模^[5]。另一方面, 各迁入国移民政策不定期调整中的合法身份获取难易程度则在更大程度上影响着新移民的发展规模。当二者“合力”作用的效果有利于人口跨境迁移时, 迁移规模发展曲线便会出现相应的“波峰”, 反之, 则会呈现“波谷”。

例如, 作为 J 村新移民主要迁入地的意大利、葡萄牙、法国、西班牙分别于 1995 年底、1996 年、1998 年前后、2000 年先后实行了不定期的大赦非法移民政策或“无证者合法化运动”^[6], 这些国家不定期的放宽移民政策对 J 村欲迁移者形成了不同时期的巨大拉力, 从而引发了该村迁移规模发展曲线中 1996 年、1998 年、2000 年的 3 次“波峰”。与此相应, 没有发生如此巨大引力的 1997 年、1999 年、2002 年则出现了 3 次相对的“波谷”。其中, 由于 1996 年前后意大利、葡萄牙先后大赦, 同时中国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颁发《公民因私

事出国护照申请、审批管理工作规范》, 二者的共同作用加大了移民的动力, 进而使得此年成为 J 村迁移规模发展曲线中的最大“波峰”。相反, 由于自 2000 年 6 月开始, 欧盟首脑会议达成协议, 决定在 2002 年底以前展开联合巡逻, 建立移民联络官网络, 制定统一的签证资料认证系统, 确定非法难民遣返计划等一系列打击非法移民的决议案^[7], 从而使得这一时期欧洲各迁入国的引力骤降, 造成了 J 村迁移规模发展曲线中 2002 年的最大“波谷”地带。

(三) 双向流动和多重流动

在总结迁移规律时, 雷文斯坦 (E. G. Ravenstein) 和埃弗雷特·S. 李 (Everett. S. Lee) 都强调了迁移流和反向迁移流的问题。认为在迁移过程中, 对于每一个主要的迁移流都会有一个反向迁移流^[8]。这种规律性认识对于 J 村也同样适用。只是 J 村人的跨境迁移不仅是双向流动, 还存在着多重流动。

1. 双向流动

在 J 村人口跨境迁移过程中, 迁出与回流是两个并存发生的过程, 构成双向流动的特征。迁出的情况我们不必再多分析, 这里我们仅就 J 村的回流现象做些讨论。笔者在调查中发现, 海外 J 村人的回流现象集中于两种形式。

一种是属于探亲性质的短期回流。海外 J 村人往往在春节前后回到家中探亲, 时间一般是 3 个月左右。当然, 这种情况并非是每年连续的, 按照 J 村人反复强调的因素, 由于国际航班的飞机票比较昂贵或是他们在国外的工作比较繁忙的原因, 多数人只能隔一两年甚至几年才能回来探亲一次。至于一些在国外的无证迁移者, 就只能等待转为有证居民之后方可回家探亲, 否则“回来了就回不去 (迁入国) 了。”

另一种是非探亲性质的回流。造成这种回流的原因又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因年龄增大无法继续承受艰苦体力劳动的“被迫”回迁

^① 注: 此图依据 J 村村委会历年台表、报表记录数据整理设计而成。其中的迁出人员为国内外迁移者的混合体。但是考虑到 J 村在国内异地迁移者数量比例极小, 因而此图基本反映的是近年来国外迁移者的数量变化特征。

者或决定“叶落归根”者回流，这个群体回来后一般不会再出国，而是留在家乡养老。二是仍有较强劳动能力但由于客观原因^①而“被迫”回迁群体回流，这部分人回来后有很大的一部分又在不久后前往其他国家继续打工。

2. 多重流动

关于J村人跨境迁移的多重流动特征，主要表现为迁移者在移动过程中的空间不确定性。为了能够便于获得一个合法的身份，迁移者在迁至目的国的过程中，往往首先选择一个容易获取身份的“中转站”^②获得当地合法定居身份，然后再前往最终目的国，这种过程便构成了多重流动。

另一方面，在J村还出现了个别“在旅行中居住”的“太空人”。村民LF告诉笔者，他的一位弟弟最早时去了洪都拉斯，获得定居权后，转到比利时打工，再到日本打工时由于签证期限问题被遣返回国。后来他又去洪都拉斯换了护照，现在已是洪都拉斯国籍，为做生意而经常在全球间坐飞机跑来跑去，去过日本2次，比利时2次，英国3次，洪都拉斯3、4次，法国、新加坡、马来西亚、香港、澳门都去过。但是，他的老婆孩子一直都留在村里，所以他也经常回到家里，一回来就可以住3个月。值得一提的是，这个个例对于我们理解当代“跨国主义”、“跨国华人”概念应当有所帮助。其在国际间的多重流动体现了当代华人流动的跨地域性特征，然而，与此同时，他对家的归属感又流露出当代跨国华人对历史记忆与文化认同的某种特别“看重”。

总之，J村人的跨境迁移已经具备了双向流动与多重流动的特征，这种特征反映了二战后国际移民往往“迁移频繁，并伴有大量的回归迁移和再迁移”^③的总体状况。

（四）迁移的代际流动——“换代迁移”

如前所述，在当代J村人跨境迁移的过程中，同时伴随着一个回流的过程。大量回流群体的出现势必会导致总迁移量的日益减少，并

趋向于零。这种推理会使我们产生一个疑问——为什么J村人跨境迁移的发展规模始终能够在1996年至2003年维持着43人/年的平均迁出量水平？显然，要回答这一问题，就要求我们必须努力去寻找弥补回流群体空位的那些替代性迁移者的来源。

通过大量的访谈与思考，笔者逐渐发现了这些替代性迁移者的来源。一方面，不少尚有较强劳动能力的回迁者的再次迁移活动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填补回流者空缺的作用。另一方面，在更大程度上作为填补回流者空缺的主体替代者则是来源于迁移者下一代的新迁移者群体。相对于改革开放早期出国的J村新移民而言，我们不妨把他们和他们下一代的迁移者分别称为第一代新移民和第二代新移民，并把这种迁移现象的代际流动称为“换代迁移”。

在如今的J村，许多父母从国外打工回来以后，自己便不再出去，而是让子女出国打工挣钱。至于原因，第一代新移民的解释是：“我们年龄大了，不能再出去了。所以我们让孩子过去。”这样，一代一代，老的回来，少的又要出去，便成了“换代迁移”。在与J村人的访谈过程中，笔者深深感受到了这种现象的普遍性。

村民JH谈到：“我儿子在英国，这边还有两个孙子，12岁和16岁，大些可能也要过去赚钱。”作为第一代新移民回迁者的村民GR谈到：“我曾经在日本打工，做苦力。女儿想读书，中学后让她自费去澳大利亚留学了。她过去5年了，已有那边绿卡（永久居留签证）。”

此外，当地学校老师也反映了这种情况，已经有不少中学毕业生踏上了或者准备将来踏上出国务工的征程。由此可见，在当代J村人跨境迁移的过程中，随着第一代新移民缘于年龄老化、劳动能力下降等原因的陆续回迁，取而代之的第二代新移民正在日益成为新移民群

^① 这里的客观原因，一般有两种：国外签证到期或劳工合同到期；由于无证原因而在迁入国不定期被抓并遣返。

^② 这种中转站一般为处在中美洲、南美洲或非洲较小的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比较容易地获得定居权。对J村人而言，洪都拉斯、毛里求斯便是他们迁移过程中的“中转站”。

体的主力军。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换代迁移现象并非J村人跨境迁移所特有的现象，在国内其他农村地区的人口跨境迁移中也同样存在。如在温州部分侨乡，“那里的孩子们从学校毕业后，就有机会去国外，所以那里在校学生中有越来越多的人考虑的就是出国，或者被大人告知毕业后一定要出国。^[10]”另外，这种换代迁移现象的存在也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人口学上的一个既定结论——“关于年龄，不论是国内和国际间的移民都是一样，即青少年和较年轻的成年人”始终“居支配地位”^[11]。

四、结 论

通过对典型个案J村新移民潮的实证解析，我们可以从微观层面观察到当代农村人口跨境迁移形态的一些基本特征。这些特征包括迁入地空间趋向的全球化态势、迁移规模波浪型演进的历时态特征、迁移者的往返双向流动与多重流动，以及代际传承中的“换代迁移”。透过对这些特征的分析，我们可以从中得出如下一些可做进一步探讨的结论性认识：

其一，迁入地空间流向的全球化态势，反映了经济全球化对当代国际人口流动带来的巨大而深刻的影响，也体现着在国际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形势下，人口国际流动将依然会朝着西方发达国家劳动力市场的主流方向迈进。

其二，波浪型演进的历时态特征反映了当代中国农村人口跨境迁移的发展规模一向受到国内外相关政策形势的“合力”作用，并越来越明显的在更大的程度上受到迁入国移民政策的重要影响。

其三，迁移者的往返双向流动呈现了迁移流与反向迁移流共存的既有理论认识，而迁移者的多重流动则不仅体现了当代人口国际迁移行为机制的复杂性和灵活性，还在空间范畴意义上孕育出“太空人”个例，从而与“跨国主

义”、“跨国华人”等概念发生了对话。

其四，代际传承中的“换代迁移”是符合人口学关于年轻人支配移民群体主导地位的定论，这种现象的存在保证了迁出地的人口迁移量能够始终维持一定的平均水平，却不会因为第一代新移民大量回迁而导致当地人口迁移量的迅速减少乃至消失。

总之，当代中国农村人口跨境迁移的特征既反映了目前世界移民潮的整体发展态势，又与中国的国情具有紧密联系。这些特征或验证了原有国际迁移理论，或突破了原有国际迁移理论。有鉴于此，在对当代中国人口跨境迁移问题的研究过程中，我们不能总是囿于原有国际迁移理论的解释，而应力争在更广泛的视野和调查基础上做出具体而恰当的论证。

参考文献：

- [1] 全国政协办公厅.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民移居海外情况的调查报告. 第51号文件, 1996. 3.
- [2] 李竞能. 现代西方人口理论.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4. 147.
- [3] 李明欢. “侨乡社会资本”解读: 以当代福建跨境移民潮为例.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2005 (2).
- [4] 瓦·维·波克希舍夫斯. 南致善, 顾鉴塘, 王钊贤, 刘学忠, 孙淑清译. 人口地理学.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7. 157—158.
- [5] 朱美荣. 福建省新移民问题剖析及相关政策初探. 人口研究, 2001, (5).
- [6] 李明欢. 欧盟国家移民政策与中国新移民. 厦门大学学报, 2001, (4).
- [7] 石刚. 全球非法移民问题综述. 国际资料信息, 2004, (5).
- [8] 顾宝昌. 社会人口学的视野: 西方社会人口学要论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2. 323.
- [9] 潘纪一, 朱国宏. 世界人口通论. 北京: 中国人口出版社, 1991. 229.
- [10] 王春光. 移民的行动抉择与网络依赖: 对温州侨乡现象的社会学透视.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2002, (3).
- [11] 威廉·彼得逊. 兰州大学人口研究室译. 人口学基础. 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4. 395.

[责任编辑 崔凤垣]